

編者按

戊戌變法開啟了中國政治的鉅變。為了紀念這一重大事件百周年，我們將在本欄連續兩期發表有關論文。本期側重討論戊戌維新的理論基礎和思想資源。

汪榮祖專論康有為如何創造性地詮釋公羊學，利用微言大義來為救世變法立言。他指出，康有為的大同哲學既吸收了佛教和西學等各種資源，也有公羊學的大一統思想。但因其學說的叛逆性，在當時被大多數士人指為「非聖無法」、「用夷變夏」，康黨也在「亂法」的罪名下被鎮壓。康有為為變法而設計的理論，實際上不利變法而利於革命，從此打開疑古和反孔的閘門。

葛兆光指出，晚清一代包括康有為在內的很多思想敏感士人不約而同地對佛學產生興趣並不是偶然的。文章側重分析佛學中哪些思想資源和境界被這批士人所接受。他認為，大乘佛教以「皆空」或「唯識」對「我執」的瓦解，和追求「超越」的理想以及「此生不足惜」的無畏精神，對有感於時局急迫性的士人來說，是既可破除並超越儒學傳統的話語霸權，又能提供批判、整合、重建基礎的重要思想武器。

王汎森側重討論戊戌前後思想資源中的日本因素。他指出，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時期的中國，對日本而言已成為反面教材，促使日本引進明末翻譯的西書，並且開始大量翻譯西著。甲午之後，出現了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中國人留學日本運動，其目的並不是學日本，而是學習經過日本選擇和咀嚼過的西方文明。事實上，戊戌的改革詔令，大部分參考了《日本變政考》。